

1940年8月20日至次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一场百团大战。此举获得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得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好评,却也留下了一些是非非。

# 百团大战鲜为人知的内幕

## 对待国共有区别

1940年,日本急于将侵华战争告一段,以集结更多的兵力南下,夺取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殖民地。为此,日军一方面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紧与蒋介石政权“和谈”;另一方面在桂南、粤北、河套、鄂北、鄂西发动新的攻势,对重庆持续大轰炸。

在华北地区,日军则实施“囚笼政策”,先后建立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封锁在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对此,中共希望打破“囚笼政策”,以往那种小规模的游击战肯定不行。彭德怀认为,必须打一场大的战役。

## 意外发现百团参加

从1940年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到最后下达行动命令,八路军总部部署的都是20来个团参加的正太战役。直到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首次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彭德怀、左权才意外地发现竟有105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也就是说,其中有85个团“没打招呼”就直接投入战斗了。

当时,不但八路军总部只部署了20来个团参战,各集团同样也只具体部署了部分部队参战。因此,“百团大

战”实际上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一级机构发动的,而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积极主动参战的结果。

百团大战还有人数与八路军正规部队相当或更多的游击队和民兵参加,并有至少20万民众参加。山西阳泉的老民兵王德顺说:“我们实在是受够了汉奸和小日本的气了!听说正规部队要打日本人,能拿起武器的人全跟着部队跑。”

8月20日,八路军在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同时发起攻击,战区内那些小据点、铁路、公路、桥梁、电线杆,绝大多数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群众进行破袭的对象,日军一片混乱,参战抗日部队因此越来越多。

## 战期延长近半年

最初,八路军总部对于百团大战并没有规定战期,只是在预备命令中要求从部队出动之日起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这大体可理解为作战一周左右。而最终,百团大战却进行达半年之久。

战斗打响后的几天内,战区内日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百团大战前期的胜利,使彭德怀产生了开展第二阶段战斗的想法。9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延安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

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需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百团大战开始后,日军于1940年9月底部署了一场“毁灭战”,对八路军进行报复。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多达5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实际出动兵力约15万人。于是,八路军各部继续反“扫荡”,直至1941年1月24日,百团大战才宣告结束。

## 没批示却肯定战绩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破袭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下发给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但中央军委对此没有正面批示。原因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

具体到百团大战,聂荣臻说:“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日常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于1940年9月10日发布《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华北“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山东和华中地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组织一次至几次

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9月18日和9月20日,延安各界连续举行群众集会,隆重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在集会上发表了《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的讲话,毛泽东出席了这次集会。

## 遭遇是是非非

抗战期间,百团大战获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但长期以来,这一伟大壮举却又遭遇是是非非。像任何一场战役一样,百团大战也存在不少主观设想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错误和失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总部和各作战部队,已经就此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由于日军的疯狂报复,百团大战的确加剧了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其困难程度,今人很难想象。如1943年3月,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

最为根本的是,多年来游击战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人,他们认为,抗战的正确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打一下就跑”,而不是百团同时参战。再加上1959年以来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文革”期间对老帅老将的错误批判,更加使百团大战是非不定。 (据《湘潮》)

# 中国曾掀起效仿法西斯潮流:发展50万会员



▲蓝衣社特务(剧照)

提到法西斯,不少人马上会想到希特勒、党卫军和纳粹旗,想到集中营里的毒气室以及数百万的犹太人流离失所,想到墨索里尼以及意大利的“黑衫党”。但是,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一次法西斯运动,这个在名为“蓝衣社”或者“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组织领导下的运动,曾经一度大权在握,控制了民国大部分城市的警备、军事力量,并且长达7年之久。

这次运动,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蒋介石自身有关。

学者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一书中曾写道:“1930年代,当时的中国流行一本名为《当代三大怪杰》的书,书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画像。那时候,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

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何兆武先生的这段文字,指出了法西斯主义引发中国人兴趣的两个原因。

其一是效率问题,因为民主体制做什么都要商量和票决,所以很多人排斥这一点。为了所谓效率,选择独裁,怀疑和非难民主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其二是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复苏。众所周知,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但是,在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手段之下,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大大增加,军事实力急剧扩张。这种现实,在中国的部分人中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形成,还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是国际形势。据《蓝衣社》一书介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留日的学生滕杰等人(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目睹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故而回国准备上书政府,提醒国人日本人的军事侵略之可能。后来,这批爱国青年上书无路,无奈之下聚拢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们,希望可以在危难之时为国家效力。他们的组织,就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后来也称蓝衣社)。

其次,是国内的原因。当时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中的名望远远不及汪

精卫、林森、胡汉民等人。而能够收拾国内局面的,在黄埔毕业生们看来,唯有他们的校长蒋介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力行社的成员们提出,要践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个提法不仅正和刚刚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意相通,客观上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如出一辙。当然,后人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力行社的运作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德国纳粹的模仿基础之上的。

至于蒋介石本人,了解到这个组织的存在之后,就充分利用了这批热血青年。其中,有滕杰、贺衷寒,还有的,就是戴笠等人。

力行社的活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不仅帮助蒋介石击垮了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和个人,同时也积极打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土崩瓦解。他们屡屡采用暗杀等手段,大肆散布恐怖主义。使得几乎整个三十年代,都给人们造成自危的感受。

1933年6月18日,一个宁静的清晨,在众多法国巡捕活动的租界街道上,四名力行社特务处成员,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杨铨和他的小儿子杨小佛大开杀戒。他们的身体被四面八方密集而来的子弹穿透。事件震惊了世界。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宋

精卫、蔡元培、鲁迅以及国内外诸多媒体,纷纷指责暗杀者的卑劣行径。但是,当时极少有人知道,这个活动是一群狂热于法西斯运动的青年军人所为。

作为一个神秘的组织,力行社渐渐发展出“革军会”“革青会”和“中华复兴社”等外围组织。成员一度达到五十万人。不过,随着组织的日渐庞大和介入政治日深,其内部互相倾轧不断。后来,西安事变期间,力行社的主要成员,因为强烈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而遭到蒋介石的猜忌和报复。众所周知,采取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其实就意味着蒋介石的死亡。故而,被解救出来的蒋介石不久就指示将力行社转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后者,在历史上同样声名不佳,是一个准特务组织。

蓝衣社或者说力行社壮大与覆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内部分人学习纳粹德国的过程。只是,随着日本法西斯不断侵略中国,蒋介石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危害。故而,最后抛弃了他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这个组织(不过,戴笠却因祸得福,凭借力行社特务处的实力,组建了“军统”)。力行社终于寿终正寝。在中国的国土上,为什么曾经有那么多的人为了种种借口而热衷法西斯主义,恐怕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据中国新闻网)